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 编

特稿

传统语言学的回顾与继承

董琨

民俗学研究

民国行业经济民俗新闻

20世纪民间故事类型学的学术意义

江汉稻作区传统农业岁时仪式述论

董晓萍
万建中
李琼
萧放

语法学研究

形容词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取决于句式

张猛

训诂学与词汇词义学研究

《说文解字》“合形字”分析——许慎汉字形体分析研究之一

现代汉语单义词素研究

论强化型偏正式双音合成词及其类型

历史传承复合词语义结构模式变化分析

《毛诗故训传》直训类型的语义分析

李运富
孙银新
符渝
卜师霞
凌丽君

文字学研究

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再探

扬雄《方言》用字考论

《房山石经》异构字的类型及其与《龙龛手鉴》的比较

颜真卿对汉字规范的贡献

楚帛书字词札记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四)

疑难字续考

赵诚
王彩琴
宋海荣
齐元涛
王志平
李国英
杨涛
王立军
杨宝忠

方言学研究

客家话、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

词汇化、语法化与语言接触

——以平阳闽南话的“等先/等一下/等一下先”为例

项梦冰
许小颖

音韵学研究

解剖《西蜀耳目资》:移植《洪武正韵》小韵与韵系重构

《说文》形声误析与《诗》韵辩证——以万光泰《经韵谐声》研究为例

《可洪音义》音切的内容、性质及其作用

《辨字摘要》的音系特点及其归属

上古章、见交替反映的齐鲁、楚、吴越、中原方言历史层次浅论

丁锋
张民权
万献初
李军
黄易青

文献学研究

再谈《说文·木部》残帙的真伪问题

何九盈

书评

《韵镜》研究的新突破

白兆麟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首发式发言选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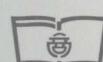
从研究经典中的经典到开创新时代

——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首发式上的讲话

何九盈
陈平原
陈雪虎

记忆中的“讲学”——关于《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

时期章太炎周氏兄弟文学观念互动考



民
俗
典
籍
文
字
研
究

第六辑

K890-55
W292



郑州大学 *04010761386-*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88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六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K890-55

W292

商務印書館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六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
文字研究中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 - 7 - 100 - 06910 - 6

I. 民… II. 北…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②汉语—
语言学—研究 IV. K892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926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ÍNSÚ DIĀNJÍ WÉNZÌ YÁNJIŪ

民 俗 典 習 文 字 研 究

第 六 编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910 - 6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1/2

定价: 40.00 元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任：董琨

委员（音序排列）：

安平秋 郭锡良 何九盈 黄天树 江蓝生 李强

刘魁立 鲁国尧 王邦维 张博 赵诚

主编：王宁

副主编：董晓萍

编务：黄易青

目 录

●特稿

- 传统语言学的回顾与继承 董 琨 1

●民俗学研究

- 民国行业经济民俗新闻 董晓萍 10
20世纪民间故事类型学的学术意义 万建中 李琼 31
江汉稻作区传统农业岁时仪式述论 萧 放 40

●语法学研究

- 形容词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取决于句式 张 猛 53

●训诂学与词汇词义学研究

- 《说文解字》“含形字”分析——许慎汉字形体分析研究之一 李运富 66
现代汉语单义词素研究 孙银新 86
论强化型偏正式双音合成词及其类型 符 润 97
历史传承复合词语义结构模式变化分析 卜师霞 106
《毛诗故训传》直训类型的语义分析 凌丽君 119

●文字学研究

- 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再探 赵 诚 137
扬雄《方言》用字考论 王彩琴 145
《房山石经》异构字的类型及其与《龙龛手鉴》的比较
王立军 宋海荣 152
颜真卿对汉字规范的贡献 齐元涛 161
楚帛书字词札记 王志平 167

-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四) 李国英 182
疑难字续考 杨宝忠 杨 涛 189

●方言学研究

- 客家话、赣语古浊上字的今读 项梦冰 204
词汇化、语法化与语言接触——以平阳闽南话的“等先/等一下/
等一下先”为例 许小颖 221

●音韵学研究

- 解剖《西儒耳目资》:移植《洪武正韵》小韵与韵系重构 丁 锋 226
《说文》形声误析与《诗》韵辩证——以万光泰《经韵谐声》
研究为例 张民权 247
《可洪音义》音切的内容、性质及其作用 万献初 260
《辨字摘要》的音系特点及其归属 李 军 272
上古章、见交替反映的齐鲁、楚、吴越、中原方言历史层次浅论
..... 黄易青 291

●文献学研究

- 再谈《说文·木部》残帙的真伪问题 何九盈 307

●书评

- 《韵镜》研究的新突破 白兆麟 312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首发式发言选载

- 从研究经典中的经典到开创新时代——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
笔记》首发式上的讲话 何九盈 317
学生记忆中的“讲学”——关于《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 陈平原 320
留日时期章太炎周氏兄弟文学观念互动考 陈雪虎 324
- 英文提要 342

传统语言学的回顾与继承

董 坤

提要： 传统语言文字学在中华学术中一向占有主流与核心的地位，进入 20 世纪的现代社会以来，却被边缘化了，其自身的发展也有所萎缩。这是基于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原因使然。传统语言文字学在现代学术中并非没有一席之地，我们不可妄自菲薄，只要重视继承和发扬其优良方法与学术规范，注意吸收现代语言文字学的营养并与之有机结合，不断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传统语言文字学在现代社会学术中的发展并取得相应地位，也是可以预期的。

关键词： 语言文字学 传统 现状 学术规范

一

这里所指的“传统语言学”，即传统的“小学”，包括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学术史上还有“汉学”、“朴学”等名称，则将“小学”包容在内，此外包括考据学、校勘学等学问。

长期以来，虽然“小学”只是被标榜为“经学的附庸”，但实际上，它是独立发展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在传统国学中占有核心和主流的地位。这是不难加以论述和证明的。我们只要举出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所说的“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经典论断，就大抵不必多所赘言了。

事实也是如此。简单举几个例子：

第一，作为经学的两大门派——经今文学派和经古文学派，以及由此产生的汉唐之学与宋明理学之争，这种争议一直绵延到大清王朝的末期（各自的代表人物分别为康有为和章太炎）。而究其根源，乃是在于对于经典的文本的释读与认同，因此，这可以说首先是属于传统语言文字学范畴的问题，也成为中国学术史方面的一个常识。

第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不论地位多高，成就多大，已然“学而优则仕”，却不能忘情于语言文字学，力图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这是因为科班出身，都饶具传统小学的根基。即以清代而论，许多官员乃至封疆大吏均在这方面多加致力，如毕沅（1730—1797）

年)官至湖广总督、兵部尚书,其《墨子校注》开近代“墨子学”先河;阮元(1764—1849年)历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自著《诗书古训》、《曾子注释》等,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梁章钜(1775—1849年)官至江苏巡抚,著有《夏小正经传通释》、《论语集注旁证》、《孟子集注旁证》、《仓颉篇校正》等;至于王氏父子:王念孙(1744—1832年)“累官至永定河道”,王引之(1766—1834年)“累官至工部尚书”;就连著《尔雅义疏》的郝懿行(1757—1825年),也官至户部主事。……真是不胜枚举。已故的当代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其在文学、史学、文献学、文物鉴定等诸多领域的杰出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自己最为在意的,却是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努力与成果,比如他曾说过:“回忆起来,这五十年工作的绝大部分,都是把文言变成白话。”^[1]这就是语言文字学的工作。当然启功先生的语言文字学已然超越了传统语言学,但是从传统语言学起步,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在开启一代新风、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清代学术概论》^[2]中,梁氏将清代学术的发展分为四期:一、启蒙期,二、全盛期,三、蜕变期,四、衰落期。“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二)而“炎武著述,其有统系的组织而手定成书者,惟《音学五书》耳。其《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造端宏大,仅有长编,未为定稿。《日知录》为生平精力所集注,则又笔记备忘之类耳。自余遗书尚十数种,皆明单义,并非巨裁”。(四)在他眼中,第一期的代表人物顾炎武,首先是作为音韵学家进入学术界的。又,“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二)这几位,众所周知更是传统语言学的巨擘大腕了。他们的学术成果,主要的甚至仅仅在于“小学”即传统语言学方面。可见梁氏对于传统语言学在整部学术史中地位的重视。这与中华文化史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是完全一致的。

二

但是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在中华学术的整体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现代语言学并未取得有如传统语言学在传统中华学术中那样的地位,甚至对于传统语言学在传统中华学术的地位,也被大大地边缘化了。这也以举一个例子:

^[1] 启功《汉语现象论丛·有关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困难和设想》,第25页,中华书局,1997年。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排本。以下只列篇目序号,不再专门注出。

上个世纪 90 年代,河北教育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主编为刘梦溪。收入丛书每部著作的前头,都冠以主编撰写的《总序》,长达 76 页。

在这篇《总序》中,有的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回顾,其中提及“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之处,所在多有,但几乎不明确提及传统语言学;虽然丛书也收了几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经典,如赵元任、董作宾的著作。

现在的“国学热”中,似乎更没有传统语言学的地位了。而语言文字学界在这方面似乎也是集体“失语”。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这种事实和现象,那么就值得探讨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限于本人的学养水平,未必能说得差强人意。

首先我们是否应该了解,什么是“现代”或“现代化”?“现代化”在思想文化方面有什么区别于传统的特质?这可以参考 1999 年版《辞海》对于“现代化”一词的解释:“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作为过程,其首要标志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其标志为政治民主、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考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3]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考系”一语。这就是说,包括文化学术的是否现代化,也必须是“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考系”,语言学自然也是如此。《辞海》也有一条“现代语言学”,注为:“指 20 世纪以来开创的关于语言系统的研究。重在口头语言的共时描写,区别于传统的以书面文献为资料的语文学研究和追溯语言源流的历史研究。一般把索绪尔奉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4]而叶蜚声先生指出:“20 世纪语言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共时描写占优势。索绪尔是实现这个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区分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他指出组合和聚合的关系,系统和意义的关系,共时和历时的关系,这些都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5]

索绪尔的这些贡献,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吸收在他之前及与他同时代的语言学科诸如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果,但基本上可以说都是他的原创,是传统语言学所不能包容的。如此,宜乎现代语言学乃至整个现代学术中就没有传统语言学的地位了。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虽然带有中国特色,却基本也是“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考系”的。这样,

[3]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版缩印本(音序)。

[4]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年。

[5]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 379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

传统语言学在当代学术界被“边缘化”，就是不难想象的了。

当然，对于现代和现代语言学的这种认知是否完全正确，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具有如此悠久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树立自己的“参考系”？如何实现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学术体系包括中国现代语言学？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思考和探究。

三

我们评价传统语言学之于现代语言学，似乎可以认为，主要差距在于缺乏诸如索绪尔体系的理论元素，在于缺乏后者所具有的若干明确的自觉的语言学理论观念。但是据初步研究，中国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语言学思想也是相当发达和活跃的。美国学者查德·汉森(Chad Hansen, 中文名“陈汉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中，以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视角考察、分析先秦诸子著作，“他发现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语言哲学问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与汉语这种语言本身的特点有关。作者提出了隐含在古典思想中关于语言的四个假定：(1)关于语言功能的假定，即语言的作用是什么？(2)关于语言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的假定，即什么样的现实模型提供了对语言功能的说明？(3)关于语言的起源和现状的假定，即语言是怎样出现的，以及我们要有何种知识才能知道怎样使用它们？(4)关于语言跟心理的或抽象的对象(思想、意义、共相、类等等)之间关系的假定中的各种各样的对比。这四个方面，不管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名家或法家，都有所涉及，只是各家涉及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6] 尽管对于类似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到位；但是即此可见，对于这些形而上的思辨性的语言学基本观念问题，在先秦诸子的理论视野中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这一传统，为什么后世没能得以继续发展，发扬光大？这似乎只能归咎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两次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戕杀与摧残：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是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到清代顾炎武、戴震、段玉裁、二王父子这些传统语言学大师那里，固然也能提出类似“因声求义”这样符合现代语言学理念的观点，但已然难以颉颃于索绪尔这种重大的理论建树工作，已然难以开启并形成一代之风了。

还可以联系同样是东方古国、我们的近邻印度。我们知道，由于古代印度重视祭祀，重视祭神时来自吠陀的颂歌，为了保持吠陀圣典的完整准确，于是产生发展所谓“吠陀六分支”，其中之一是“毗伽罗”即语法学，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就产生集大成的语法学著作《波你尼经》。但是，现代语法学并不是直接承继自印度语法学，而是来自印欧语

^[6] 李先焜《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译者序》，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系的比较语言学(虽然后者多少吸取了波你尼语法学的营养)。正如岑麒祥先生所指出的:“古印度人语文研究的成果是巨大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可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气候和丰腴的土壤,终于不能在原地蓬勃发展,开花结实。”^[7]这其间的曲折奥妙,同样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四

传统语言学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遭际及现状如何?我们不妨从最宏观的角度考察一下传统语言学的三大块——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

由于清末以来,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以及随后带铭青铜器和战国简帛材料的大量出土,使得自《说文》发轫的传统文字学大有用武之地,其与现代考古学、历史学和传统文献学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现代中华学术的一大亮点和持续的前沿。此外,由于新的语言文字理论和观念的注入,基本上已经构建了源于传统而又具有现代科学理念(包括应用中的标准和规范)的汉字学。

音韵学这一块,则由于传统只是研究历史语音,只能着力于音理而不能进入实际音值的层面,由于古代音值难以实证,所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始终是言人人殊,难以产生可以共同接受的结论(复辅音问题即为一例)。这当然影响到音韵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无法与现代的实验语音学抗衡。不过,“这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由于西方现代语音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多年来理论和教学队伍的培养(音韵学知识是方言调查的基础)以及研究材料和范围的拓宽(从传统韵书到出土文献,从拘于汉语到结合汉藏语系研究,从重视古代到与中古、近古并重),改革开放以来大为活跃,成绩斐然”。^[8]

至于训诂学,早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就指出:传统语言学“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科,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其名物一科,考明堂,考燕寝,考弁服,考车制,原物今既不存,聚讼终未由决。典章制度一科,言丧服,言禘祫,言封建,言井田,在古代本世有损益变迁,即群书亦未由折衷通会。……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二十)就是说,传统训诂学在晚清就已成强弩之末(当然,梁启超的看法是否正确,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加之50年代的“厚今薄古”,给以致命一击,于是萎缩沉寂几达三十年。不过,“80年代以来则有所中兴,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会,举办培训班,编写有关教材,在归纳总结乾嘉以来训诂学说和成果的

[7]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古代语言学史》,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8] 董琨《新中国语言学50年》,载《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基础上,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定位学科的性质和任务,整理诠释旧有的术语,探讨古代语言学主要是语义方面的内部规律(如同源词、词义引申)以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老一辈虽已陆续谢世,但薪尽火传,训诂学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之中”。^[9]况且训诂学解读与训释传统文献的工作远未完成,在出土文献即古文字材料的释读方面,也能大大发挥作用。

五

传统语言学最早是经学的附庸,它一开始就是致用型的学问。在它逐渐独立之后,除了仍然具有服务于传统文献释读的功能之外,它形成了独有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建立了严谨的学术规范。

梁启超非常重视归纳和总结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清代学术概论》不止一处论及这一点:

然则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经义述闻》所厘正之各经文,吾辈自童时即诵习如流,惟王氏能注意及之。凡学问上能有发明者,其第一步工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十二)

一般认为胡适是一位“洋派”的国学大师,因为他曾留学美国达七年之久,又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信徒。殊不知他对中国传统学术也是至为留意,1919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认为清代的“朴学”最具科学精神,他指出朴学包括四个部分:

一、文字学(Philology)。包括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等。

[9] 董琨《新中国语言学 50 年》,载《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二、训诂学。训诂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物观的证据，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

三、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校勘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四、考订学(Higher Criticism)。考订学是考定古书的真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10]

可以看出，在胡适的心目中，清代“朴学”的核心即为“小学”亦即传统语言文字学。此前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序言中，他说：“我对近两百年来，中国学者在训诂学和校勘学的研究成果，曾尽量加以利用……因为只有通过训诂学的研究，吾人才能摆脱古人主观注疏的成见，而真正能了解古代典籍的原义。”^[11]因此，胡适对传统语言学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美留学期间，胡适还曾撰写《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等有关古代汉语语法的文章，晚年他还十分得意地提及这些文章，说道：

我所要说明的便是在我于一九一—和一九一六年所写的三篇文章里，我的首要兴趣便是归纳法；也就是把相同的和不同的例子归纳起来加以比较研究，以求其概括性的结论。那也是我第一次企图发展我自己的治学方法。我那研究代名词的两篇文章(《尔汝篇》和《吾我篇》)，都说明了我对时代变迁所影响的语言和文法上变化的研究兴趣。^[12]

其实，归纳法本来就是传统语言学的主要的治学方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专门论及：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覩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既已如此，则试思每一步骤进行中，所需资料几何，精力几何，非用极绵密之札记安能致者？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共推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苟一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又不惟专书为然耳，即在札记本身中，其精

[10] 《胡适全集》，第1卷，第37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 同上，第18卷，第287页。

[12] 同上，第18卷，第282页。

到者，亦必先之以初稿之札记，——例如钱大昕发明古书轻唇音，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故顾氏谓一年仅能得十余条，非虚言也。（十七）

我们不能认为胡适抄袭梁启超，因为他又有这样的表白：“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国之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辛亥年（1911年）作《诗经言字解》，已倡‘以经说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自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其时尚未见《经传释词》也。……”^[13]且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1921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所以只能认为他们是针对学术史同一现象的考察而得出的同一结论。

六

最后我们必须着重提及传统语言学作为乾嘉学术核心所树立和标榜的学术规范问题。梁启超对此也有很精彩而经典的归纳：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剽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十三）

这里提到的“认为不德”（或“大不德”），“在所必摈”，都是有关学术道德与规范的问题，非常精辟而深刻，即使在当今，也是很有针对性的。

何九盈先生指出：“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内容相当丰富，成就不可低估。”

^[13] 《藏晖室札记》卷十五，载《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第132页，中华书局，1993年。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全书结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这后十二个字,言简意赅。我们拥有数千年传统保留的珍贵中华文化遗产,万不可妄自菲薄。从发展学术来说,我们当然需要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和国外现代语言学的许多具体结论和成果,站在巨人的肩上,进行我们的攀登。因此,对于所有这些以乾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严谨的学术规范,在我们寻求突破现有学术研究范式和水准的今天,在浮躁乃至腐败学风泛滥的今天,应该是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继承和发扬的;而传统语言文字学自身在现代社会学术中的发展并取得相应的地位,也是可以预期的。

(董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00732,北京)

民国行业经济民俗新闻

董 晓 萍

摘要：民国时期在北京刊印的很多报刊反映了城市传统行业与北京城市社会变迁的历程中的各种关系，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传统行业成为北京城市社会变迁历程的窗口，二是传统行业管理成为北京城市社会制度化管理的重要对象，三是传统行业利益的认同和转型成为北京现代城市社会构建的一种象征。多角度解读和利用这批报刊，可以扩大研究北京城市行业经济民俗的文献资源。

关键词：民国报刊 北京城市社会 传统行业 经济民俗新闻

以往我们忽略使用民国报刊研究北京城市行业经济民俗，实际上，民国报刊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一种文献资源。以清末民初为例，当时北京经历了帝制崩溃和民国兴起的巨大变迁，进入了现代城市社会（Modern Peking Society）的建设进程，在北京刊印的一批报刊正反映了这种变迁。它们出于新闻体的特点和反映社会事件的需要，在记述北京城市社会的重建过程与危机现象上，空间范围比较明确，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上层政府管理与广大社会读者的喜闻乐见上也有契合点，能将社会运行的制度化、新闻话题化，也能将基层社会舆论表层化。通过这批报刊，大体可以看到，传统行业是北京城市社会变迁历程的窗口，传统行业管理成为北京城市社会制度化管理的重要对象。在北京历史上没有城市工业的情况下，传统行业还成为北京现代城市社会制度化的基本单元，也是现代城市社会政策的运行行为（conduction）、日常实践（practice）和可以集体利益化（如行业会馆和同业公会）的个体表现（performance）。那些主动参与城市社会制度化变革的传统行业资本拥有者，成为富有活力的城市基层社会的代表。城市社会运行的基本问题如经济和人口等，经常见诸报端，并以通货膨胀、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作为新闻的热点，加以报道，形成隐蔽膨胀新闻、投资规模新闻和城市社会公共安全新闻。在上述种种情况下，传统行业的经济民俗传承与变迁也成为北京现代城市社会转型文化的内容。本文以《益世报》和《北平民报》为个案，主要使用这两种报刊的资料，重点使用其中的经济新闻、社会调查栏目、广告和漫画文字，对这类报刊的一些长线栏目进行连续统计，对这类报刊记述行业经济

民俗的特征、编辑立场和学术价值进行分析。

一 北京行业经济新闻的特征、商用词语和事由分析

《益世报》和《北平民报》都是平民报纸^[1]，其中，《益世报》是长线报，办了 31 年，所设“京闻”、“社会调查工作”、“益智稷”等专栏和铁路货栈的广告新闻，商讯丰富，可以从全国的角度看北京。《北平民报》是短命报，办了 85 天，反映出民国初期的社会动荡、报业无常，但此报仍相当耐读、好读，是一份给北京人看的报纸。记者以北京人的身份，报道北京每天发生的事情，谈论北京人关心的问题。其出刊时间是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所刊登西方困境和北京行业工潮的消息，接连不断。仅以 1929 年 10 月 25 日的报纸为例，第二版有社论《谈谈碰车问题》，报道北京人力车夫与电车工人争饭碗的冲突；第四版有成都旗人生活调查；第八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夜莺文学社的学生主持，联络人为谢冰莹。此人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知名女作家。两报的编辑立场都很明确，保持公益化的口径，接近中小商铺，传达底层呼声，体现民族工商业的利益，宣传爱国思想，反映普通官员、职员、巨贾、商贩、工人、农民、学者、学生、市民、工匠、文学界、演艺界、外国人、宗教人士和外来流动人口等各阶层、各文化背景人员的热点问题。总之，这两份报纸对我们观察清末民初北京行业经济新闻史料所呈现的社会公共画面和行风市情有参考意义。

所谓“行业经济新闻”，指该两报中与当时北京行业生产与商贸流通相关的经济活动新闻。在形式上，它们有版面新闻和广告新闻两种；在对象上，它们有北京商会、天津商埠、欧美商船、中交两行、商行商标、同业公会、中小商贩、商品粮、商品房和自由行市等报道。考虑到新闻内容的繁复庞杂，报道角度的五花八门，消息真伪鱼目混珠，在本文中，以“行业经济新闻题目”、“商用词语”和“事由”为要素，将各种新闻资料加以归纳，将其中三要素叙述相对完整或线索完整的商业新闻遴选出来，制成分析样本。共 118 条，其中《益世报》57 条，《北平民报》61 条，占作者查阅行业经济新闻总数的 79%。为方便使用这批资料进行分析起见，兹将部分样表摘录如下。

^[1] 《益世报》，国家图书馆缩微藏版，时期为 1917.1—1948.12。1927 年前的部分版面又称《益世白话报》。报头英文译名为“Social Welfare Peking”。中华邮务总局挂号特许报纸。日报。本文重点使用该报的时间是 1917.1.18—1917.3.31, 1927.1.1—1927.2.28，共四个半月。主要讨论第 7 版的“益智稷”、京闻和社会调查工作专栏，兼及其他部分版面的时事、漫画画评、宗教和广告新闻。《北平民报》，国家图书馆缩微藏版，时期为 1929.8.1—1929.10.25。日报。两张八版。《北平民报》共生存两个半月，存量不大，本文重点使用了其中大多数“社会调查”栏的文章。